

# 纳粹时期 KWG 科学家非人道行为引发的思考

王洪奇

(山西医科大学,山西 太原 030001)

**【摘要】**文章揭露了纳粹统治时期德国威廉皇家学会某些研究所的科学家在医学、遗传学和人类学等相关领域从事反人类活动的罪恶历史,试图通过这一“反例”说明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相统一、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相协调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医学伦理学,医学史,KWG/MPG,人体实验,双胞胎实验

**【中图分类号】**R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565(2003)02-0003-03

**Thought of KWG scientists' nonhumanism Behavior during the Nazi Period**

*Wang Hongqi*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1*)

**Abstract:** The author exposed the evil history that the scientists in the KWG had been engaged in nonhumanism research activities during the Nazi period. Through the negative example, the author elaborated the two consensus of scientific accomplishment and humane accomplishment, means rational and humane rational are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Key words:** Medical Ethics, history of medicine KWG/MP, human - body experiment, twins experiment

纳粹专制时期德国科研组织曾被作为战争机器,成为希特勒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纳粹时期德国科学与医学领域的种种罪恶行径并没有引起我们国家有关学者的足够重视。本文对纳粹统治时期威廉皇家学会(Kaiser Wilhelm 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Wissenschaft, KWG)的一些研究所和科学家在医学相关领域开展罪恶研究的行径进行初步揭露和批判。

## 1 有关问题在德国的研究现状

威廉皇家学会在纳粹时期非人道的科学研究可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科学家个人的犯罪行为;二是皇家学会研究所的犯罪行为。在德国,为了便于开展对纳粹统治时期某些科学家罪恶行径的研究,作为皇家学会的继承者,马普学会(Max Planck 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Wissenschaft, MPG)于1973年建立了专门的历史档案馆(Bibliothek und Archiv zur Geschichte der MPG),<sup>[1]</sup>向有关研究人员提供帮助。1990年,学会举行了隆重仪式,将纳粹时期受害者的遗骸(原为生物医学学部各研究所陈列的“组织”和“标本”)安葬于慕尼黑公墓,建立了纪念馆。1997年,马普学会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调查原皇家学会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各种罪行。2000年10月14日,马普学会与赫姆霍兹联合会以及联邦研技部共同举办了“安乐死”受害者纪念会,将德国科学家在纳粹统治时期开展的罪恶的人体研究内幕公布于众,以起警世作用。2001年6月7日,马普学会主席马寇(Hubert Markl)发表讲话,对纳粹时期的非人道做法公开道歉。<sup>[2]</sup>

皇家学会作为一个科研组织,虽然没有任何决议让它的科研机构或科学家参与这种犯罪行为,然而在该学会工作的那些科学家、研究所领导人在纳粹统治时期直接参与非人道研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涉及到的研究所有:皇家人类学研究所、皇家人类遗传学研究所、皇家优生学研究所、皇家大脑研究所、皇家精神病学研究所等机构。

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直接面向受害人的犯罪行为集中在三个方面:(1)协助制订纳粹种族法,包括1935年的纽伦堡

法,实施所谓“种族卫生”。在此方面皇家学会的一些所长、首席科学家及其合作人员是纳粹政策的主要支持者,甚至是有关活动的发起人。(2)研究并实施安乐死。纳粹实施安乐死是基于优生学和“民族卫生学”基础之上的。甚或仅仅因为科学实验之需要,就可以随意去杀犹太女人。(3)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等处设计并实施人体实验。如:皇家人类学研究所科学家开展的“种族抗病毒蛋白质特异性项目”研究、双胞胎对照实验研究等。

## 2 “种族抗病毒蛋白质特异性研究”与 Mengele 双胞胎实验

“种族抗病毒蛋白质特异性研究”、双胞胎对照实验是纳粹医生所进行的罪恶研究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项目。该研究项目由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弗叙尔(Otmar von Verschuer)负责,开始于1942年,具体由曼格尔(Josef Mengele)实施,他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sup>[3]</sup>他主要是挑选双胞胎、矮子和有特殊生理体征的人作为实验组。1943年秋,有一对匈牙利双胞胎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这对青年男子,年龄都是18岁,具有运动员般的体形,极其英俊,身上有丰富的体毛。在最初几周进行了拍照。拍照完成后,他们被带到一个房间,其中有一只大热水桶,桶中还放着一条凳子。他们被强行捆绑在凳子上,直到热水越过头顶。经过这样反复几次投入热水桶中,他们的毛发被全部拔掉。年轻人疼痛难忍,大声喊叫。接下来的几天是从他们的肾、前列腺和睾丸中获取组织标本。在两天多的时间里,多次强行收集精液标本。之后,他们被带进解剖实验室。在这里,曼格尔向双胞胎的心脏分别注射氰仿,以保证双胞胎在同一时间死亡。接着是解剖双胞胎,把他们的器官送到柏林的生物、种族和进化研究所。<sup>[4]</sup>

尽管曼格尔不是皇家学会会员,也不代表该组织,但他是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弗叙尔的徒弟,是该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曼格尔1938年毕业于法兰克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其导师就是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弗叙尔,证据充分表明,毕业后师生两人依然保持密切的合作研究关系。我们无法清晰知道其中所有的细节,但是,弗叙尔的确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所发生的一切。曼格尔为“科学研究”而杀人,弗叙尔则在

背后对这种杀人行为直接地施加着影响并起着导向作用。纳粹时期的这种罪恶行径使弗叙尔在战后无法留在马普学会从事研究工作,但他还是在德国 Münster 大学谋得一个教授职位,并使那里成为德国遗传学研究中心。<sup>[5]</sup>

马普学会主席马寇向世人谢罪时指出:面对那些曾经遭受过皇家学会科研人员的非人折磨的受害者,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并向克尔(Eva Mozes Kor)太太、拉克斯(Laks)太太表达我最深的愧疚。<sup>[6]</sup>

他所说的克尔太太,是当年从奥斯威辛集中营恶魔曼格尔夫手掌中得以死里逃生的“实验材料”中的一位。时至今日,她依然清楚地记得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遭遇。她和她的双胞胎姐妹米瑞姆(Miriam Mozes Zeiger)被恶魔曼格尔夫选定为血液实验对象。当时她们还只是不到 11 岁的普通双胞胎犹太少女。这一双姐妹受尽折磨。克尔太太回忆,那天她和姐姐的体内由于被曼格尔夫注射了一种不知名的针剂,使他们终生受尽折磨。长期以来,他们的身体忍受着难以言表的巨大痛苦。克尔太太如今已 68 岁高龄,她希望能够在她的有生之年听到有关曼格尔夫实验的真相,以及这一实验与她姐妹米瑞姆死于特殊肾病之间到底具有什么关系。她从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被解救出来后创办了“曼格尔夫实验双胞胎受害者协会”(Children of Auschwitz; Nazi Deadly Lab Experiments Survivors, CANDLES)。根据克尔太太所掌握的情况,大约有 100 对左右的双胞胎从曼格尔夫实验中死里逃生,这些人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身心受到很大摧残,终生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且症状惊人地相似。因此他们都想知道,到底在他们的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实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实验,实验的目的是什么。<sup>[7]</sup>

纳粹时期德国科学家和医生的堕落随处可见,施耐德(Carl Schneider)医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和教授,他利用纳粹的安乐死计划来为他的罪恶研究服务,使用心理评估方法研究集中营中的儿童心理。实施安乐死以后,他还收集了这些被害儿童的大脑并进行解剖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畏罪自杀。<sup>[8]</sup>

又如,施迪弗(Hermann Stieve)教授是柏林大学著名解剖学家,同时也是柏林某大医院的医生。他利用大屠杀,对女性受害者进行生殖医学研究。当盖世太保决定将要处决某一位处于生殖年龄阶段的妇女时,他们总要将执行死刑的准确日期提前很多天告诉施迪弗,施迪弗则将行刑的日期直截了当地告诉那位将被处决的妇女,然后他就开始研究由此造成的精神损伤对于该妇女生殖系统(如月经周期等)所造成的影响。到了执行死刑后,他又将她的骨盆器官取下来进行解剖学研究。在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时,从来没有考虑过世界上还有伦理二字。战后,他在东柏林地区的洪堡大学医学院担任系主任职务,站在大学讲坛上向医科大学生讲授他曾开展的有关体外受精研究,以及在集中营对女性施暴的情况,他的报告使医学生惊骇。<sup>[9]</sup>

纳粹医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还进行了人体冰冻实验,以寻找解决德军在苏联所遇到的寒冷气候问题的途径。该实验项目由纳粹医生拉施尔(Sigmund Rascher)领导,是最为残忍的人体试验项目之一。实验要求确定把人的体温降低到死亡所需要的时间,并寻找使冻僵者重新苏醒的最好方法。纳粹医生将活人放到大水桶里进行这种冰冻实验,或者在零度以下把人裸体捆绑在担架上放到室外进行冷冻。实验对象多是年轻健康的犹太人和俄国人。纳粹医生先把一个用来测量人体温度降低情况的绝缘管插入受试者的直肠,然后把受试者扔进装满冷水的大桶,开始降温直到冰冻。当体温降低到摄氏 25℃ 时,大多数受试者都失去了知觉。苏醒实验则是把冻僵了的受试者再放到温水中慢慢地加热。这个方

法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缓慢加热是关键,因为许多被冻僵的人由于快速加热而发生颤动。实验结果由拉施尔直接向希特勒报告。<sup>[10]</sup>

纳粹医生所实施的杀人计划包括:安乐死项目、绝育实验、极低体温实验、高原试验、病毒与细菌战试验、有计划灭种和屠杀等。靠着吮吸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狼奶成长的这些科研人员已经失去了人性,演化成了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人体实验的野兽。

### 3 从 Pernkopf 氏人体解剖图看纳粹毒藤的蔓延

纳粹主义的毒藤在当时就已经越出国境在欧洲滋长蔓延。从奥地利大学医学院当年出版的彭科夫(Eduard Pernkopf)氏人体解剖图中可以略见一斑。他的书至今可以从网络上邮购到,如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出版公司于 1990 年出版的一套 Atlas of Topographic and Applied Human Anatomy(由 Werner Platzer 翻译)要卖到 300 美元。<sup>[11]</sup> 1998 年 10 月 1 日,维也纳大学副校长公布,该校解剖学教研室在 1938 - 1945 年间制作彩色解剖学挂图的过程中,至少有 1377 具尸体由盖世太保转运过来,当时该教研室的负责人就是彭科夫。<sup>[12]</sup> 这一事件说明法西斯体制的影响已经越过德国国境。

发现彭科夫犯罪事实的过程是非常偶然的。美国纽约有一个名叫艾斯瑞尔(Howard Israel)的口腔外科医生。每次给病人做手术之前,他都要参阅 1963 年出版的彭科夫氏解剖图。但是直到 1995 年,他才知道彭科夫具有纳粹历史背景。出于好奇和历史责任,艾斯瑞尔医生追溯到 1943 年版(第一版)彭科夫氏人体解剖图。他惊讶地发现,该书扉页上有纳粹党十字标记和党卫军勋章记号。在该书序言中彭科夫将此解剖图集的出版归功于“插图画家的艺术性创作和尸体”。<sup>[13]</sup>

艾斯瑞尔大夫想知道被彭科夫用于解剖的尸体到底从哪里来。为此他与加拿大多伦多地区一所医学院的塞德曼(Bill Seidelman)教授进行了接触,后者是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许多有声望的德国医学院依然在沿用纳粹时期制作的人体标本。这些标本是纳粹政策受害者的遗骸,而医学教授们正在他们的手中举着这样的标本来指导他们的医学生。

彭科夫生于 1888 年,1912 年从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1921 年起在医学院解剖学教研室担任讲师职务,1933 年升为教授并担任解剖学教研室主任一职。1938 年 3 月 13 日德国军队占领奥地利,4 天后他被任命为医学院院长。此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解聘医学院 173 位犹太教职员的工作岗位,解聘人数占全院教职员总数的 53%。被解聘的人员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如生理学教授利佩(Franz Lippay)博士等。艾斯瑞尔大夫和塞德曼教授还寻找到了彭科夫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担任院长发表就职演说时的照片。当时他身穿纳粹制服,声称:“医生的职责不仅为适者生存服务,而且要让那些不适者灭亡。”<sup>[14]</sup> 在彭科夫这类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纳粹党徒对于“不适者”所实施的大屠杀如同宰杀动物;受害者的尸体只有运送到彭科夫那里为他做解剖研究之用,才算“不适者”唯一之正途。

### 4 从 Butenandt 看战后纳粹科研人员的境遇

证据表明,皇家生物化学研究所著名科学家布特南特(Adolf Butenandt)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不光彩行为。但在二战以后,他却极力掩盖事实,还吸收了几十个在二战中有问题的科研人员加入他所领导的研究机构,从事科研活动。他是生物化学家,因发现性激素荣获 1939 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他死于 1995 年。新近在柏林发现的一封信件表明,他支持了一项研究,其中涉及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采集血液样本、安乐死以及销毁绝密材料等事实。<sup>[15]</sup>

这一情况最初是由德国分子遗传学家缪勒亥尔 (Benno Müller-Hill) 于 1984 年在一本书中详细地公布出来的, 书名是《杀人的科学》(Murderous Science: Elimination by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Jews, Gypsies, and Others in Germany, 1933 - 1945)。项目负责人是布特南特的朋友弗叙尔, 血液样本由弗叙尔的门徒曼格尔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等地采集, 血液分析则由布特南特的助手亥尔曼 (Guenther Hillmann) 完成。由他们几个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推知布特南特不可能不了解这其中的情况。但是, 直到布特南特去世都不承认他自己了解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所发生的事情, 也不承认他自己同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弗叙尔的研究项目以及他的部下亥尔曼的研究项目之间有任何牵连。<sup>[16]</sup>

历史学家普若克特 (Proctor) 从足有 80 米长的有关布特南特的个人档案资料中找到有价值的证据。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布特南特在一封信中曾命令亥尔曼毁掉存放于研究所的“Geheime Reichsache”(纳粹时期定为绝密级别的文件) 级别的所有文件和资料, 此外, 普若克特还找到了其他一些证据, 如: 在 Rechlin 飞行实验基地, 布特南特参与了德国空军 (Luftwaffe) 的一系列实验, 尽管这种实验的意图和根本目标还不清楚。还有一些文章指出, 布特南特的一个博士后研究生曾将 6 名癫痫病患者带到德国空军的低压试验场进行人体实验, 以区别遗传的和非遗传的癫痫病。<sup>[17]</sup> 但是, 战争一结束, 布特南特后来成为德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家, 在 1960 到 1972 年期间还担任了马普学会主席一职。

战后纽伦堡“医生审讯庭”对于纳粹时期科学家的犯罪行为做出了审判。宣告 15 名科学家有罪, 其中 7 人被处于绞刑, 但是, 更多科学家则被认为无罪或者根本就没有起诉, 而逃脱惩罚。历史往往在捉弄常人。斯沃灵 (Hans Sewering) 医生过去曾为纳粹效力, 但他在 1992 年却被选为世界医生联合会的主席。<sup>[18]</sup> 该组织原本是在纽伦堡“医生审讯庭”基础上于 1947 年组建的一个学术团体, 其中心任务就是对世界各国医生的职业伦理和道德实施监督管理。在这样一个组织中竟然混入前纳粹医生, 并被推选为主要领导岂非怪事。

德国科研人员的境遇与盟国的对德政策有直接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西方三国之所以对这些德国科研人员采取一种宽容的政策, 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一定的关系, 主要是出于东西方冷战的考虑。为了节制苏联势力的扩张, 他们有必要利用这些科学家的才智为西方社会服务, 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冷战的需要, 这些科学家被其他国家掳去继续从事相关研究, 并做出了“杰出”贡献。如盟军攻入柏林后, 英国占领军拆除了威廉皇家空气动力研究所的风洞实验装置, 拘留一些知名的核物理专家, 其中有皇家物理学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海森伯 (Werner Heisenberg)、皇家化学研究所所长哈恩 (Otto Hahn) 等, 其中海森伯是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 哈恩是核裂现象的发现者。皇家医学研究所所长生化学家库恩 (Richard Kuhn) 在盟军占领德国以后的最初 6 个月竟被美国情报官员提审了 77 次, 这中间显然存在着提取有关维生素的研制和生产等科学情报的问题。苏联军队则掳走了留在柏林的科学家和大部分设备。美国特种部队 ALSOS 拿走了全部用于核研究的仪器、设备、资料和原有材料。根据美国战地技术情报局 FIAT 和英美联合情报资料调查小组委员会 CIOS 提供的名单, 美国特种部队一共从德国掳走 642 名“外国专家”, 其中有著名的火箭专家冯布劳恩 (Wernher von Braun)、施图林格 (Ernst Stuhlinger) 和德布斯 (Kurt Debus), 这些人对后来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做出了巨大贡献。<sup>[9]</sup>

## 5 启示

科学研究绝不能漠视他人的尊严和生命, 科学研究不是

纯粹理性游戏, 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与研究者在人格上具有平等关系, 不能将他人看作可供为所欲为的“实验对象”, 看作“物质”或“材料”。以个体方式存在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他最基本的权利, 基本的人权同他的种族或信仰无关。科学领域自由研究的边界应当由不可剥夺的人权做出严格的限定。上述德国科学家在纳粹时期将灵魂抵押给恶魔, 自觉充当帮凶, 沦落为杀人恶魔, 这一教训是深刻的。它使我们认识到人性教育的重要性, 认识到科学素质与人文素质相统一、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相协调的重要意义; 也使我们看到了不讲人性和不走人道的极度危险。正如陈独秀先生所讲: “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 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 即使不很长久, 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sup>[20]</sup> 发生在德国的反科学、违背人伦天理的罪恶行为尽管是短暂的, 但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 波及整个世界。值得人类, 尤其是科学界作为反面教材的典型而永远警惕。

## 【参考文献】

- [1] <http://www.mpg.de>
- [2, 6] Hubert Markl: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pening of the symposium entitled “Biomedical Sciences and Human Experimentation at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s. The Auschwitz Connection”, <http://www.mpg.de/reden/2001/biosymposium/markl-e.htm>
- [3] Josef Mengele The Angel of Death, <http://www.crimelibrary.com/mengele/young.htm>
- [4] Medical Experiments of the Holocaust and Nazi Medicine, <http://www.remember.org/educate/medexp.html>
- [5] President Hubert Markl apologizes to victims of Nazi crimes committed in the name of science, <http://www.mpg.de/news01/news0110.htm>
- [7] Eva Mozes Kor: Healing from Auschwitz and Mengele's Experiments, <http://www.mpg.de/reden/2001/biosymposium/mozeskor-e.htm>
- [8] Therapie - Carl Schneider - Arbeit macht frei, <http://www.foucault.de/therapiecarlschneider.htm>
- [9] William E. Seidelma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Nuremberg Medical Tribunals, <http://www.ipnw.org/MGS/V3Seidelman.html>
- [10] Medical Experiments of the Holocaust and Nazi Medicine, <http://www.remember.org/educate/medexp.html>
- [11] <http://www.allbookstores.com/book/0683068547>
- [12 ~ 14, 17] William E. Seidelman: Medicine and Murder in the Third Reich, <http://www.adl.org/braun/dim-13-1-med-murder.asp>
- [15] Ulf Schmidt, The History of the Kaiser - Wilhelm - Society During National Socialism, <http://www.ukc.ac.uk/history/staff/material/schmidt/symposium.html>
- [16] Benno Müller-Hill, Murderous Science: Elimination by Scientific Selection of Jews, Gypsies, and Others in Germany, 1933 - 1945,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 Press 1998
- [18] Nazi Hunter Update, <http://abclocal.go.com/kgonews/021002-iteam-nazi-hunter.html>
- [19] 王洪奇. 德国 KWG 学会的早期活动及其社会背景[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1997, 6
- [20] 王思睿、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J]. 书屋, 2000, 4

## 【作者简介】

王洪奇 (1958 - ), 男, 山西医科大学副教授, 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 卫生经济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医学社会研究和教学工作

【责任编辑 李恩昌】